

第 一 编 中国近代新式教育 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章 近代新教育的萌芽

1840 年爆发的鸦片战争,以《南京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大炮和兵舰轰开了关闭 120 多年的中国大门,有着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华帝国被无情地卷入资本主义世界性扩张的漩涡中。马克思曾经指出:

“英国的大炮破坏了中国皇帝的威权,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①“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②

马克思的论述,深刻地揭示了鸦片战争的性质及其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一方面,这是号称“日不落帝国”的英国殖民主义者发动的一场旨在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图谋征服与掠夺中国的野蛮的殖民战争。另一方面,从世界范围看,它又是当时地球上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陈腐的、代表中世纪农耕文明的、经济技术落后的东方封建主义制度,与新兴的、代表近代工业文明的、拥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2 卷,第 3 页,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

②同上,第 26 页。

先进经济技术的西方资本主义制度间的一场特殊形式的碰撞。^①碰撞的结果“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国开始了走向世界的艰难历程。先进、文明与侵略，落后、陈腐与道义奇妙地交织在一起，铸成了近代中国绵延百年的历史悲剧。中国传统封建教育的解体和近代新式教育的产生发展，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下起步的。

一、“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下传统教育的困惑

清代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已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它既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终结，又是中国近代社会的起点。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代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最高、最完备的形态，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比之前代都有进一步发展。鸦片战争前的近二百年间，清代的教育曾经有过辉煌的历史，作为少数民族入主中原，清朝统治阶级接受并自觉地提倡中国传统文化，“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在继承明代教育体制的基础上，大力发展各级各类教育。据史籍记载，至 1825 年，全国有包括府、州、厅、县、旗、卫各类官学 1788 所。^②有清一代的书院，更是在数量上远迈前代，“统论清代二百余年，书院遍於天下……合之十余行省必近二三千之数”^③。此外，还有数量更多的各种形式的社学、义学和私塾。正是这种相对发达的教育网络，使清代人口中的识字率达到相当水平。据张仲礼在《中国绅士》一书中统计，1840 年前后，全国生员（指通过正规考试取得在各级官学读书资格的人，不包括通过纳

①陈胜彝：《鸦片战争前后中国人对西方双重挑战的回应》，《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 年第 1 期。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1096。

③商衍鎤：《清代科举考试述录》第 225 页，三联书店 1958 年版。

捐取得上述资格者)达 739,199 人,占当时全国总人口数 402,300,000 的 0.18%。^①事实上,乾隆时曾一度规定,府考时每中额 1 名(取得生员资格),送应试生 50 名,这一规定虽未严格执行,但这个比率基本延续下来,以此推算,大致具有进入官学学习所需文化程度的人当占总人口数的 9% 左右。如果考虑到通过纳捐途径取得生员资格的人一般均有一定的知识,至少须粗通文墨;而这类人员与通过正规考试取得生员资格者的比例通常是一比二,那么,总人口中的识字率将上升为 13% 左右。应该说,对于幅员辽阔、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封建帝国而言,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②中国传统教育在封建社会晚期,出现了回光返照似的一抹光彩。

(一)盛世之后的衰败

康雍乾盛世,延续了近一个世纪。至乾隆后期,终于由盛转衰。土地兼并的加剧,人口的急剧增长,吏治败坏,贪污公行,激化了潜伏在盛世之下固有的社会矛盾。从 18 世纪后半叶开始,北方白莲教、南方天地会的农民起义,以及边疆和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的抗清斗争,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清王朝在盛世之后,已无可奈何地步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颓境。与此相适应,嘉庆以降,传统封建教育再难重现昔日的辉煌。翻检时人的议论和后人编纂的史籍,再也找不到诸如“天子右文,群臣躬遇休明,翊赞文化,彬彬称极盛矣”^③等不无夸张而又大体反映了实际情况的充满激情之语,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封建教育体制已是百孔千疮:

^①张仲礼:《中国绅士》第 100 页,上海社科院出版社 1991 年版。

^②作为参照物,日本在明治维新时期(1873 年)学龄儿童的就学率是 28%。(日本文部省编:《学制百年》)。

^③《清史稿》卷 106,中华书局 1976 年版。

关于太学：

“其后司教者渐失初指，廩粟坐拥，皋比荒落。监生一经捐纳亦得滥厕其间，人遂以太学为丛垢矣。”^①

关于各级官学：

“近年生徒入学，不过轮期画到，查学之日，教习择其在家课读者，背诵数章塞责，该教习亦止于画到，查学时始行到学，间有在学住宿者，并不教读。其宗室、觉罗及咸安宫、景山各官学，亦复如此。”^②

关于书院：

“未几山长以疲癯充数，士子以儇薄相高，其所日夕啾唔者，无过时文帖括，然率贪微末之膏火，甚至有头垂垂白不肯去者。”^③

关于科举取士：

“今世科场之文，万喙相因，词可猎而取，貌可拟而肖，坊间刻本，如山如海。四书文禄士，五百年矣，士禄于四书文，数万辈矣。”^④

人们批评当时的士风是：

“数十年来，承学之士，华者聘词章，质者研考据……风尚既成，转相祖袭，牢不可诘，天下之士，遂真以食色为切己，廉耻为务名，攫利禄为才贤，究义理为迷惑，而官箴玷、民俗薄、生计绌、狱讼繁，百害籍籍，乘此而起。”^⑤

编印于嘉庆年间的《文章游戏》一书，收入一篇《学堂通弊记》，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96，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②《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393。

③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100。

④《龚自珍全集》第 344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年版。

⑤潘德舆：《晚醒斋随笔序》，《养一斋集》卷 18，道光二十九年刊本。

文中用诙谐辛辣的笔触描述了当时学堂的学生生活，士风、学风两相对照，似更能说明问题：

“杭城之文风最盛，吾人之学问宜优。抱膝长吟，想见前人深致；读书怀古，夙称志士高风。无如此日之书斋，用功者少，可奈近来之子弟，偷懒者多。未闻爱惜寸阴，不过了其故事。况乃弊端百出，居然习以为常。要顽儿只说除腐气，好耍子推做活文机。讲讲谈谈，空挨岁月。嘻嘻笑笑，虚度光阴。看诗书，阅经传，聊且乘兴一时斗口角，讨便宜，从不让人半句。文期将到，先愁明日何题。交卷已完，脱却自家干系。搭起空心架子，或可欺同类之人，究其实在根由，终难对先生之目。惟是口衔烟袋，手捧茶杯，此往彼来，案位何曾坐着。东游西荡，书声久已无闻。逍遥古董摊头，游戏旧书场内。五更梦醒，立心尚想读文章，两顿饭完，却恨依然无主意。”^①

太学、官学、书院，科举、士风、学风，鸦片战争前夕传统封建教育的各个层面，均已露出衰微破败的景象。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每逢王朝末造，有关学校荒芜、士风日下的记载，可以说史不绝书；至于朝野上下对科举取士制度的批评指责，更是自宋明以来从未间断。如果清王朝所面临的仍然是封建社会周期性的改朝换代危机，那么，上述传统教育的衰败也许只是一种相对暂时的现象，随着王朝更迭会逐渐得到调整。但是，这种局面终究未能再现。西方资本主义的东来，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运行轨道，农民大起义的急风暴雨又加速了这种脱离旧有轨道的离心力，传统教育与它赖以存在的封建社会一样，被迫走上了近代化的曲折道路。

^① 繆良：《文章游戏·初编》卷2，宏道堂刊本。

（二）两种冲击

发生于 1840—1842 年期间的鸦片战争和 11 年之后爆发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尽管是来自外部和内部的两种性质不同的冲击，但对于正在走向衰败的传统封建教育而言，其影响和作用却是相反而相成，具有大致相同的文化意义。

1. 游离于传统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洋学堂

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与英、美、法等国先后签订《南京条约》、《虎门条约》、《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用坚船利炮轰开中国的大门之后，又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巩固和扩大他们的侵略成果。割取香港和五个口岸城市的开放，使殖民主义者获得了经营中国的基地和由沿海向内地推进的孔道。有关允许外国人和传教士在通商口岸居住和建立教堂的规定以及嗣后道光皇帝发布的准免查禁天主教的上谕，“为大有开展的传教工作开辟了一个门径”^①。商人、外交官、军士和传教士纷至沓来，至 1850 年前后，在华外人总数已达 500 余名，其中，基督教传教士 150 名，约占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包括来自欧洲大陆的 15 名，来自英国的 47 名和来自美国的 88 名。^② 凭藉不平等条约不请而至的这些西方人士，就各自来华的活动领域和追求的具体价值目标而言是不尽相同的；但是，他们都把自己看做是西方文明的代表，都把自己的活动视为传播西方文明、改造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在这一点上又是不约而同的。其中，尤以传教士的活动更具典型意义。在这里就传教士的早期办学和译书活动，对传统教育的冲击作一些初步的分析。

①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第 159 页，商务印书馆 1959 年版。

② 《中国丛报》卷 20，第 520 页。

近代西方传教士把创办学堂作为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并不是从鸦片战争之后才开始的。早在 1818 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和米怜（William Milne）即在马六甲创办了以中国学生为主要教育对象的教会学校——英华书院。书院“以交互教育中西文学，及传播基督教理为宗旨”^①，涵盖中学与小学范围。所设课程包括宗教、英文、中文、数学、天文、地理、伦理哲学等。米怜为首任院长。书院在马六甲历时 25 年，1843 年迁至香港。在校就读的华人学生多时达 200 余人。最早在中国本土开办的教会学校是马礼逊学堂，由马礼逊教育协会主办，1839 年 11 月 4 日在澳门成立。教师是美国长老会传教士布朗（Samuel Robbins Brown）。学校为中小学程度，开设课程有宗教、中文、英文、天文、地理、历史、算术、代数、几何、初等机械学、生理学、化学、音乐以及传统儒家典籍《四书》、《易经》、《诗经》、《书经》等。^② 1842 年学校迁香港，1850 年停办。由于清政府实行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这两所最早的以教育中国学生为主的教会学校，只能分别办在马六甲和澳门。前者远离中国本土，后者则由于自 1573 年以来澳门一直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所长期霸占的特殊原因才得以在澳门立足。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以后，局面大变，不仅英华学堂、马礼逊学堂迅速迁至香港而且，新的教会学校在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纷纷设立。据统计，至 1860 年以前，各国教会在上述六个地区（包括香港）开设的教会学校有 50 所左右，学生有一千余人。

如果从教会学校在中国发展的全过程来看，1860 年以前的

① 《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2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②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28 页。

近 20 年远不是它的辉煌时期,充其量只能说是‘事属草创’而且,50 所学校和一千名学生与以后教会学校的大发展比较,无论是数量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换一种角度,如果从教会学校对于中国传统封建教育体系而言是一种完全陌生的新的教育机构的角度审视,问题就要复杂得多。

第一,早期教会学校毫无例外地都把传播宗教教义、培养宗教感情放在首位,这与中国传统教育的非宗教性以及各级学校始终注重儒家伦理道德熏陶的办学宗旨大相径庭。

第二,教会学校的课程设置‘均本以和平传播基督教及东方一般文化之原则,冀以达致有效影响为目的’^①。宗教课程之外,均程度不同地开设天文、数学、生理、历史、地理等课程,儒家典籍和经史之学的研习被大大冷落,这对中国传统教育几千年来陈陈相因的教学内容格局是一种明显的突破。

第三,主持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们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西方近代教育的一些基本观念、教育制度、教学方法等运用于自己的办学实践活动中,使教会学校不同程度地体现出西方近代教育的特点。

第四,早期教会学校中涌现出一批女子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在 1860 年以前,教会所创办的女子学堂即有 16 所之多,其重要者如宁波女塾、香港女子寄宿学校、上海裨文女塾、上海徐汇女校、福州女塾、广州女子日校等。女子走出家门到学校去读书求学,对于传统封建教育而言,更是不可思议的。

上述种种特点,不仅使教会学校作为一种完全陌生的新教育

^①《马六甲筹组英华书院计划书》,转引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 123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版。

机构游离于传统封建教育体系之外，而且，就其总体倾向性来说，它们存在的本身就是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冲击和挑战。当然，早期教会学校在创办和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巨大的困难，传统夷夏之辨社会心理的抗拒排斥，“爱人如爱己”的空洞说教与殖民主义者强盗行径的鲜明反差所激起的强烈的民族情绪，都迫使传教士们不得不在贫民百姓、村夫俗子中开辟工作，不得不通过免收学费、提供食宿、奖励衣物的办法招徕贫家子弟入学，这些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忽视了教会学校的冲击和影响。直至 19 世纪 50 年代，在清政府的官方文书中极少提及这些学校。咸丰元年（1851 年），浙江学政吴钟骏奏称：“宁波府城诸夷杂处，左道易惑，见饬各学教官于乡镇中劝立义学以正人心。”^①以“劝立义学”来抵制“左道易惑”，可以看做是清朝统治阶级用来对付教会学校影响而采用的一种手段。与这种苍白无力的防范措施相比较，传教士们对教会学校的创办却劲头十足，雄心勃勃。19 世纪 60 年代以后，随着《天津条约》等第二批不平等条约的陆续签订和国内新经济因素的产生增长，教会学校由沿海到内地，由通商五口到遍布全国，由初等教育而中等教育、高等教育，获得了迅速发展。对传统教育的冲击和影响亦由微而著，终至形成一个独立于传统封建教育体系之外的教会学校系统。

编译出版书刊，作为传播福音的辅助手段，与创办学堂一样，从开始就受到传教士们的高度重视。1842 年至 1860 年的近 20 年间，传教士在香港和开埠的五个口岸城市共编译出版西书 434 种，详细情况如表 1-1 所示。

^①刘锦藻：《清朝续文献通考》卷 97。

表 1-1 六个城市出版西书统计(1842—1860)①

城市名称	香 港	广 州	福 州	厦 门	宁 波	上 海	总 计
宗教书籍(种)	37	29	26	13	86	138	329
所占比例(%)	61.7	69	61.9	100	81	80.7	75.8
科学书籍(种)	23	13	16	0	20	33	105
所占比例(%)	38.3	31	38.1	0	19	19.3	24.2
总数(种)	60	42	42	13	106	171	434

在总数 434 种书籍中,属于宗教宣传品者计 329 种,占 75.8%,这当然是由传教士们编译出版书刊的初衷所决定的。所余 105 种书籍,其内容涉及数学、天文、地理、植物、医学、历史、经济、道德、语言、风俗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诸多领域。许多书籍的出版,在近代西学传播史上具有开创性意义,如蒙克利(Edward T. R. Moncrieff)编的《算法全书》是第一部在中国境内出版的用西方数学体系编成的数学教科书;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口译、王韬笔述的《重学浅说》是近代中国译介的第一部关于西方力学的专著;合信(Benjamin Hobson)所编的《全体新论》等医书是近代输入的第一批西医著作;艾约瑟(Joseph Edkins)、李善兰合译的《植物学》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植物学著作;哈巴安德(Andrew Patton Happer)的《天文问答》、合信的《天文略论》是介绍西方近代天文学的第一批著作,等等。②这些西学书籍的编译出版,不仅解决了当时教会学校所急需的教材问题,也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潜移默化中改变着部分士人的知识结构、思维方式,并进而导致他们对外部世界,对自然、人生、历史的

①②熊月之:《1842年至1860年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94年第4期。原表数据有误,供参考。

观念的转变。近代中国科技教育的先驱李善兰、徐寿、华蘅芳，近代早期改良派思想家、因担任格致书院监院培养新型人才而在近代教育史上有重要影响的王韬，他们的成长都与积极参与编译或认真研读这些西学书籍有密切的关系。

教会学校的创办和传教士的早期译书活动由于蕴含着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教育和文化的某些因素，对于正在走向衰败的传统封建教育来说是一种不可低估的冲击力量。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对中国教育近代化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影响，由于资本主义列强不道义的侵略行径和传教士们以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并不高尚的目的而大打折扣，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感并遭到不同程度的抵制，特别是在 19 世纪 60 年代以前，这种影响，更多地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

2. 武器的批判

相对于以坚船利炮和不平等条约为后盾、由传教士为主体所介绍的西方教育和文化而言，太平天国起义者们用大刀长矛为武器，以‘火烧’‘水浇’的暴力方式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冲击，似乎来得更为直观、激烈，更具震撼的力量。

在《南京条约》签订后的第十个年头，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爆发了气势磅礴的农民起义。饱受贪官污吏压榨而饥寒交迫的贫苦农民，高举‘奉天讨胡’的旗帜，揭竿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纵横驰骋大半个中国，坚持斗争 14 年之久，在中国农民起义的历史上，演出了最为悲壮的一幕。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发生在西方资本主义入侵之后，中国社会开始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转化的历史条件下，时代的影响和塑造，使它带有传统农民起义所不具备的外观和特点。洪秀全所创立的拜上帝会，从西方基督教原始教义中汲取了“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的朴素平等思想，加以改造，以适应农民斗争的需要，借来一个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无所不在的‘上帝’，来打倒、否定和扫荡人世间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权威。传统农民起义所追求的改朝换代建立理想社会的现实目标，披上一层宗教的神秘外衣，变为上帝的旨意，由此激发出的巨大力量，给封建的政治、经济、文化以猛烈的冲击。

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对传统封建教育的冲击是多方面的，从中国教育近代化的历程看，可以大致概括为两个方面。一是主张教育的平等性、普遍性，反对封建教育的等级性和男女受教育权的不平等；二是对封建教育中处于至高无上地位的孔孟学说给予无情的批判和扫荡。

1853 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由洪秀全批准颁发的《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其中关于文化教育方面的政策有：

“凡二十五家中设国库一，礼拜堂一，两司马居之……其二十五家中童子俱日至礼拜堂，两司马教读《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及《真命诏旨书》焉。凡礼拜日，伍长各率男妇至礼拜堂，分别男女行，讲听道理，颂赞祭奠天父上主皇上帝焉。”

“凡内外诸官及民，每礼拜日听讲圣书，虔诚祭奠，礼拜颂赞天父上主皇上帝焉。每七七四十九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两司马礼拜堂讲圣书教化民，兼察其遵条命与违条命及勤惰。”^①

在这里明确地提出了对辖区内的儿童和成年人不分男女、不分长幼进行普遍的、平等的政治教育、宗教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原则。以解决土地所有制为核心的《天朝田亩制度》，由于其绝对平均主义的空想性脱离中国的社会实际，而在许多领域并未能贯彻实行。

^① 《太平天国》（一），第 32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但是，上述文教政策却在很大程度上得以实施。以太平天国时期最普遍、最通行的教育形式‘上礼拜堂’和‘集会听讲道理’为例，时人的记载中，无论作者对太平天国起义持何种态度——赞赏或者是仇视，都留下生动、直观的描述：

“每二十五家设一礼拜堂(天厅)。每礼拜日，师帅、旅帅、卒长更番至其所统属的两司马礼拜堂中去讲道并巡察。全体兵士、人民、妇女、婴孩，每月聚会一次，于旷地搭起天篷，建立讲坛，听取王或官长的讲道，其内容系关于纪律、军事、民事和社会行政问题。”^①

“太平天国尊重妇女地位，认为妇女为男子的伴侣，在教育上她们受到了同等的注意，在宗教上她们受到了谆谆的教诲，在宗教礼拜中她们也享有适当的位置。”^②

这是曾在太平军中任职的英国人呤喇 (Augustus Frederick Lindley) 的亲身感受。

“礼拜堂开七日参，天兄天父诵喃喃，两班男女齐争跪，黄纸焚来是笑谈。”^③

“大方伯里火烧场，垒土成台作讲堂，台下万人来听讲，不知道理在何方？（大方伯里辛酉破城后，民屋全毁。克复后，但见高筑一台，为讲道理之处。）”^④

“锣鼓四声麾令旗，听讲道理鸡鸣时，桌有围，椅有披，五更鹄立拱候之。日午一骑红袍驰，戈矛簇拥箫管吹，从容下马严威仪，升座良久方致辞：……听者已倦讲未已，男子命退又

① 呤喇：《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 248 页，中华书局 1961 年版。

② 同上，第 233 页。

③ 陈庆甲：《金陵纪事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6 册，第 402 页，中华书局 1963 年版。

④ 丁葆和：《归里杂诗》，《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第 6 册，第 462 页。

女子 女子痴憨笑相语,不讲顺利讲倒理。’^①

在这些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嬉笑讽刺中,仍然透露出太平天国教育所贯彻的上述原则。

也许太平天国对科举制度的改革更能说明问题。科举是中国自唐代以来地主阶级网罗人才、培养统治骨干,给教育发展以重大导向的“抡才大典”。由于对参加考试的人有严格的出身限制,所以在表面的平等竞争之下掩盖着事实上的不平等。清代定制,凡“出身‘不正’如门子、长随、番役、小马、皂隶、马快、步快、禁卒、件作、弓兵之子孙,倡、优、奴隶、乐户、丐户、蛋户、吹手’等,都不准应试。此外,复有冒籍之禁,不是本地的人,不准参加考试。^②太平天国把这些限制一概取消;‘不论门第出身’,不分本地流寓,一律准予考试。据有关史料记载,1854年,太平天国在湖北、安徽开科取士,湖北取中举人 800 多名,安徽计 785 名。^③反动文人曾有“天朝一统四十二里半,文武各官三百六十行”^④的讥讽,这后半联恰好从反面说明太平天国在改革科举制度网罗人才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在定都南京后,太平天国还举行过女试。南京女子傅善祥中式第一名被派往东王府任东殿内簿书,替东王杨秀清批判军国大事。时人传有“棘闱先设女科场,女状元称傅善祥”的诗咏其事。^⑤

应该指出的是,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在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活动中所体现出的这种平等性、普遍性原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

^① 马寿龄：《金陵癸甲新乐府》，《太平天国》（四），第 736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7 年版。

^② 《光绪大清会典》卷 32，礼部。

^③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 2 册，第 1306、1307 页，中华书局 1991 年版。

^④ 陆筠《漏网唱鱼集》，外一种：《海角续编》第 126 页，中华书局 1959 年版。

^⑤ 转引自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 2 册，第 1288 页。

了农民阶级对千百年来被剥夺了文化教育权的义愤和反抗；但从根本上来说，它更是现实的政治斗争、军事斗争需要的反映。对于千百万分散的、缺乏共同联系而又无知无识的农民而言，实施平等的普遍的政治思想教育、宗教教育和社会教育，是组织动员他们投身反清斗争，并在斗争中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有力保证。如果联系到太平天国教育的内容（充满宗教色彩）和具体形式（简陋而原始）来看，这一点就更加明显。从这个意义上讲，太平天国反对传统封建教育的等级性和两性差别，与其说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毋宁说是一种不自觉的斗争需要。19世纪中叶，历史的发展没有赋予农民阶级建立平等教育的责任，农民阶级也不可能真正完成这一任务。尽管如此，这毕竟是千百万人的一次规模空前的实践活动，传统封建教育等级森严的秩序被搅乱了，作为一场农民起义，它已无愧地完成了时代赋予自己的使命。

在封建社会里，孔孟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至圣先师”，作为顶礼膜拜的偶像，以孔孟学说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是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也是几千年封建教育的灵魂。太平天国农民起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反孔群众运动，从近代教育的发展来看，它开启了百余年来绵延不断的以各种形式否定、批判、冲击孔孟学说至尊地位的历史潮流。

1843年，还在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酝酿时期，作为塾师的洪秀全就做出了抛弃私塾中供奉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牌位的惊世骇俗的举动。在1848年完成的《太平天日》一书中，洪秀全谴责儒书“甚差谬”；教人糊涂”，并编造了一个“皇上帝”鞭笞孔丘的故事。“推勘妖魔作怪之由，总追究孔丘教人之书多错。”孔子被捆绑鞭打；哀求不已”。^①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后，三令五申，罢黜

^① 《太平天日》，《太平天国》（二），第6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